

世界学术名著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模仿律

Laws of Imitation

[法]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著
Gabriel Tarde

[美] 埃尔希·克鲁斯·帕森斯 英译
Elsie Clews Parsons

何道宽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842. 6/41

2008

Laws of Imitation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何道宽 / 译

「美 埃尔希·克鲁斯·帕森斯
Elsie Clews Parsons

「法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Gabriel Tarde

模仿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模仿律/[法] 塔尔德著;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ISBN 978-7-300-08802-0

I. 模…

II. ①塔…②何…

III. 模仿-研究

IV. 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1320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模仿律

[法]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著

[美] 埃尔希·克鲁斯·帕森斯 英译

何道宽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1.75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48 000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我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多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本套丛书则旨在译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我们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这套丛书拟按学科划分为若干个子系列，经过不断地筛选和积累，将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的见仁见智，以及我们选择眼光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总 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跟进和发展。而知识的传承，学校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界与思想界以及业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则不必长期在黑暗中自行摸索。

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自近代起，许多学人倾力于西方典籍的译译，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建立贡献至伟。然而，由于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对年轻，如果说梁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那么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落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这与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很不协调，也间接造成了新闻与传播“无学”观点的盛行。

从1978年以前的情况看，虽然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在中国兴起已有半个世纪，但是专业和学术译著寥寥无几，少数中译本如卡斯珀·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和小野秀雄的同名作等还特别标注“内部批判版”的字样，让广大学子避之如鬼神。一些如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等与本学科有关的经典著作的翻译，还得益于其他学科的赐福。可以说，在经典的早期译介方面，比起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来，新闻学与传播学显然先天不足。

1978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闻与传播教育和大众传播事业在中国如日中天。但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

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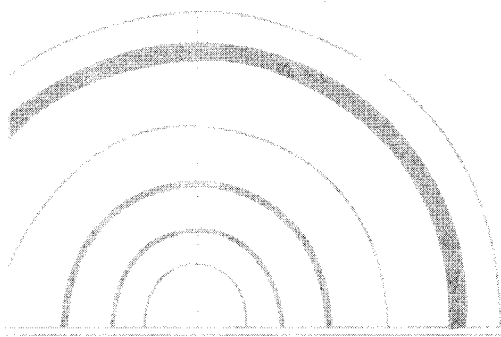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新闻学产生于新闻实践。传播学则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以及新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选择的著作,在反映新闻学研究的部分代表性成果的同时,将具有其他学科渊源的传播学早期经典作为重点。我们并不以所谓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理论学派/务实学派”划线,而是采取观点上兼容并包、国别上多多涵盖(大致涉及美、英、德、法、加拿大、日本等国)、重在填补空白的标准,力争将20世纪前期和中期新闻学的开创性著作和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推介出来,让读者去认识和关注其思想的原创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本译丛的译者采用的主要是第一种解读方式,力图通过背景介绍和详加注释,为读者从他们自身的语境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打下基础。

“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社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各界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编委会



中译者前言

一、塔尔德的再发现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Gabriel Tarde, 1843—1904) 是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 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刑事犯罪学、统计学等方面均有杰出成就, 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两个高潮。从他在世的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20 年代, 他在欧美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为第一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在美国涌现出一些美丽的浪花。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鼻祖罗伯特·帕克 (Robert Park)、美国人类学界的祖师爷弗兰茨·博厄斯 (Franz Boas) 都深受他的影响。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开山祖 E. A. 罗斯 (E. A. Ross) 1908 年的《社会心理学》, 是美国人传播塔尔德社会心理学思想的最重要的著作。本书的英译者横跨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大家埃尔希·克鲁斯·帕森斯夫人也深受他的影响。

第二个高潮始于20世纪后半叶,标志之一是芝加哥大学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特里·N·克拉克(Terry. N. Clark)根据塔尔德的著作编辑翻译的《传播与社会影响》,该书于1969年问世。

深受他影响的美国著名学者还有:富兰克林·亨利·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詹姆斯·波尔德温(James Baldwin)、阿尔比昂·斯莫尔(Albion Small)、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莫里斯·詹诺维茨(Morris Janowitz)、拉尔夫·H·特纳(Ralph H. Turner)、路易斯·M·基利安(Lewis M. Killian)、库尔特·兰(Kurt Lang)和格拉迪斯·恩格尔·兰(Gladys Engel Lang)、爱德华·西尔斯(Edward Shils)。

四位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研讨传播问题,也受到他的启示。他们是米德(Goerge Herbert Mead)、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杜威和帕克。后世传播学家把他们奉为先驱。大哲学家杜威十分关注“大众”社会的现象,希望媒介能“重组大众社会中的群体”。库利揭示媒介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与文化,他进行了第一次尝试。帕克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奠基人之一,最先将报业当成社会与文化机构来研究。米德是社会心理学象征互动论的创始人。美国学术界的社会学习论、创新扩散论和意见领袖论,都脱胎于塔尔德“模仿理论”。

让我们从特里·N·克拉克教授在《传播与社会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的长篇绪论中撷取三段话,从中管窥塔尔德对20世纪美国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传播学产生的重大影响:

詹姆斯·波尔德温认为,他是“在世学者中声誉最卓著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之一。”阿尔比昂·斯莫尔认为,“塔尔德目前是社会学这门新学科先驱里杰出的——也许是最杰出——的先驱。”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赞誉塔尔德是“当代领头的思想家之一”。富兰克林·吉丁斯在英文本《模仿律》的序言中也对他赞誉有加。

他给美国第一位人类学系主任弗兰茨·博厄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通过博厄斯而深深地影响了数以十计的美国人类学家”……奇怪的是,塔尔德可以给人类学界的论战双方提供灵感,既激励文化扩散说的干将,又激励独立发明说的学者,因为他给两种文化现象都提出了基本的原理。

通过帕克，你可以在后来许多论公众、集体行为和大众传播的学者身上看见塔尔德思想的烙印。这些学者有：赫伯特·布魯默、莫里斯·詹诺维茨、拉尔夫·H·特纳、路易斯·M·基利安、库尔特·兰和格拉迪斯·恩格尔·兰。爱德华·西尔斯论中心和边缘的文章使塔尔德含笑九泉。

中国学者对塔尔德的研究，也成为这第二个高潮中的一朵浪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传播学的“大师经典系列”译丛，收入了塔尔德的《模仿律》和《传播与社会影响》，这就是对中国学术界研究塔尔德兴趣的呼应。中国的法学界、心理学界对塔尔德的研究早已开始，但仅限于几篇论文。

塔尔德在中国法学界和心理学界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传播学界对他的研究却刚刚开始。法学家推崇他的《刑法哲学》，对他的犯罪社会根源说深表赞同，心理学界推崇他的《模仿律》，尤其是他的模仿说和人格理论。我们希望，《传播与社会影响》和《模仿律》的出版，能够给中国学术界提供一笔丰厚的遗产。

《传播与社会影响》的中文版是根据1969年美国的英文版翻译的。这本书的英文译者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国际社会学学会会长特里·N·克拉克(Terry N. Clark)。他为英文版做的几万字序文是献给塔尔德的一座丰碑，充分说明这个社会学先驱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模仿律》的中文版是根据一百年前美国的英文版翻译的。这本书的译者埃尔希·克鲁斯·帕森斯^①和序文作者吉丁斯^②都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兹引用吉丁斯教授的几段话，以显示塔尔德在他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模仿律》是他最有趣、最重要的著作。他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家……美国学者早已熟知他意义隽永的著作。”

“《模仿律》1890年出第一版，1895年出第二版。此时，塔尔德已

① 埃尔希·克鲁斯·帕森斯(Elsie Clews Parsons, 1874—1941)——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社会批评家，曾任美国人类学学会会长、民俗学会会长、民族学会会长，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宗教和美国黑人的民俗研究中成就杰出、贡献卓著，著《宗教纯洁》、《恐惧与常规》、《家庭》、《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宗教》、《社会自由》、《社会规则》、《守旧的妇女》。——中译者注

② 富兰克林·亨利·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 1855—1931)——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学先驱，以“类群意识”说闻名，代表作为《社会学原理》、《人类社会的理论研究》、《人类社会的科学研究》。——中译者注

经完成现象存在的哲学体系，而且迅速将自己的构想用文字表现出来。和一般的哲学家不一样，他风格紧凑，言简意赅，条理清晰。”

二、塔尔德为什么受到遮蔽？

既然塔尔德是世界级的学术巨人，为什么我们对他知之甚少呢？既然他身居法国社会学的三位创始人之列，为什么他的思想长期受到遮蔽呢？世人对他的影响认识不足，中国学者对他的研究长期滞后，何以至此呢？这要从法国学界的门派之见和语言的隔阂说起。

先说法国学界的门派相争。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Marie Francis Comte, 1798—1857）、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和塔尔德，同为法国社会学的先驱，三人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孔德是法国社会学的老祖宗，孔德死后的两大主帅却势不两立。迪尔凯姆和塔尔德两人在世期间以及两人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迪尔凯姆占了上风，塔尔德的思想却没有得到继承和发展。让我们将他们两人门派相争的因果归纳如下：

1. 孔德的思想偏重实证主义哲学，塔尔德偏重抽象的哲学思辨，虽然他也借用统计学来阐述他的《模仿律》和《刑法哲学》。迪尔凯姆得到孔德思想真传，把实证主义推向极端，塔尔德偏离孔德的传统，自然就享受不到他的荫庇。

2. 在法国的两股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中，他代表着弱势的一方。孔德去世之后，社会学两大流派的主帅分别是迪尔凯姆和塔尔德。他们代表两个对立的思想体系，迪尔凯姆继承笛卡儿主义，塔尔德代表的是自发性思潮。迪尔凯姆倾向于极端的唯实论，塔尔德则自称是唯名论者。迪尔凯姆主张社会学与哲学、本体论、形而上学决裂，塔尔德主张开掘这些宝藏。

3. 在两套敌对的学术体制中，迪尔凯姆处在强势的一方，塔尔德处于弱势的一方。迪尔凯姆的立场是教会、政府、军队和国立大学的立场；塔尔德抱定反资产阶级、反体制的姿态。塔尔德是自发性思潮的代表，反映破落贵族、乡村农夫、都市无产者的立场，从唯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向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起攻击。

4. 迪尔凯姆在国立巴黎大学执教，垄断最重要的学术资源；塔尔德在私立大学任教，而且这些私立大学后来纷纷衰败，所以他只能够在国立大学之外享有盛名。

5. 巴黎大学授博士学位，所以迪尔凯姆有世代嫡传的弟子担任吹

鼓手；塔尔德执教的法兰西公学是私立大学，不授博士学位，所以在法国的学术精英中，他没有多少嫡传弟子，也没有多少人继承、弘扬和鼓吹他的学术成就。

6. 塔尔德的大多数著作没有及时翻译成英文和其他语言，故而不能在英语世界和其他地区广泛传播。

7. 塔尔德的“模仿说”可以比较完美地解释心理现象和社会事实，他认为社会学与心理学密不可分；迪尔凯姆拒绝这样的观点，认为社会学不能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

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学术巨匠在中国不太为人所知，原因很简单，他的十几部社会科学著作，只有人零零星星地提及，没有人动手翻译。他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2005年，离他去世已经101年了。由此可见，《传播与社会影响》和《模仿律》的中文版问世有利于中国学术界“再发现”塔尔德，有利于我们对他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刑法学、犯罪心理学、统计学、传播学、经济学、哲学界的朋友们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三、塔尔德在传播学中的地位

塔尔德是社会科学巨匠，他当然可以进入“社会学大师”、“法学大师”的行列。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他的著作放进“传播学经典”之中呢？要而言之，有以下几个理由：

1. 传播学滥觞于20世纪前夕，成形于20世纪20年代，定型于20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塔尔德的学术思想活跃于20世纪前后的40年，那是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各门学科互相渗透，难解难分，所以他横跨当时最重要的几门学科，是非常自然的。20世纪传播学诞生之后，人们到此前的学者和学科中去寻找它的根基、胚胎、萌芽，是理所当然的。传播学的源头不仅可以追溯到塔尔德，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欧洲传统，甚至是古希腊的学术传统。

2. 传播学是一门大杂烩，直到今天，围绕它的学科地位、源头、奠基人、主帅，以及它的学科范围和前景，还存在不少争论，传播学要在学科内外寻找一切可能的学术资源。笔者2003年为华夏出版社翻译《交流的无奈》、随即又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译介塔尔德的著作，也是这种寻求的一个折射吧。

3. 学界公认的传播学先驱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提出的“两步流程传播说”（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民意测验

和市场调查，其实和塔尔德的思想就有先后的继承关系。

4. 他关于“群众”、“公众”、“舆论”、“传统”、“理性”、“报纸”、“书籍”、“模仿”、“发明”、“信念”、“欲望”、“时尚”、“传统”、“宗教”、“崇拜”、“对立”的论述，仍然极具震撼力。一百年后，其中的一些精华仍然使人觉得难以超越，你不得不佩服他这样先知先觉的天才。所有这些观念和思想无不成为美国传播学界长期使用的有力工具。

5. “模仿即是传播”——这是我对塔尔德模仿观念的理解、翻译和表述。塔尔德的“模仿”（imitation），其实就是“传播”（communication）。今天的传播学家把“传播”一词无限泛化，这和塔尔德泛化“模仿”是一回事。我们把上文里的关键词语做一点置换，不就得到了今天传播学的关键词语吗？“模仿”=传播；“从内到外的模仿”=从内到外的传播；“从上到下的模仿”=从上到下的传播；“从下到上的模仿”=从下到上的传播；“双向流动的模仿”=双向流动的传播。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6. 本书第五章“逻辑模仿律”中论述的各种模仿规律也就是传播规律，所有的传播学者都可以从他这里学习到方法论和分析框架。

7. 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超逻辑模仿律”详细论述了“模仿律”本身的演进规律，又将其用来分析和描述语言、宗教、政治、立法、经济、道德和艺术等领域里的文化演进、变迁和传播。这里的许多闪光思想仍然可以照亮我们今天传播学的研究道路。

四、本书精要

在塔尔德的十余部社科著作里，“模仿律”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把这些模仿规律细分为“逻辑模仿律”和“超逻辑模仿律”，“从内心到外表”和“从上到下”扩散的模仿律，还有双向互动中必然包含的“从下到上”流动的模仿律。

请容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塔尔德“模仿律”的几个核心概念和首要规律概括如下：

1. “模仿”。塔尔德主张泛模仿说，认为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模仿。在本书第二版序中，他给模仿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一个头脑对隔着一段距离的另一个头脑的作用，一个大脑上的表象在另一个感光灵敏的大脑皮层上产生的类似照相的复写……我所谓模仿就是这种类似于心际之间的照相术，无论这个过程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如果我们说，凡是两个活生生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社会关

系，两者之间就存在着这个意义上的模仿。”他把模仿的重要性推到极端。他说：“模仿是不可抗拒的：社会是模仿（Society is imitation），模仿仿佛是梦游症。”（74页，以下页码均为英译本页码）他又说：“一切或几乎一切社会相似性都来自于模仿，正如一切或几乎一切生物相似性都是靠遗传获得的。”（98页）他区分各种各样的模仿：“模仿有风俗模仿或时尚模仿、同感模仿或服从模仿、感知模仿或教育模仿、不知不觉的模仿、有意识的模仿，如此等等”。但是他强调无意识的模仿：“模仿可能是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自发、自愿或不自愿的……许多模仿行为自始至终都是无意识的、无意为之的。口音和举止的模仿就是无意识的，与我们的生活环境相关的理性和情感的模仿行为，常常是无意识的、无意为之的。”（192~193页）

2. “反模仿（counter-imitation）”。这是他在第二版序中提出的一个新观点：“实际上，模仿有两种，一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对象，一种是反其道而行之。……社会由一群人组成，他们表现出来的许多相似性，是模仿或反模仿（counter-imitation）造成的。人们经常进行着反模仿，尤其是在不虚心向别人学习或没有能力搞发明的时候。在反模仿的时候，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刚好是相反的。”他又说：“我不是说反模仿一无是处。虽然反模仿培养党派精神，也就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平和与好斗的分裂，但是它使争鸣的人享受到探讨问题的纯社会性的乐趣。”

3. “非模仿（non-imitation）”。所谓非模仿就是无模仿。他说：“我们不能够把反模仿和系统的非模仿混为一谈……非模仿并非总是一个简单的否定的事实。由于不可能接触而没有社会接触，没有接触就没有模仿。”纵向的非模仿就是斩断传统，横向的非模仿就是拒绝模仿邻居、异族，拒绝屈从于外来压力。非模仿的思想曾经在博物学派中所向披靡，一个“最卖劲的一种论证是，日本和中国这两个远东民族将一切欧洲文化堵在门外。”同时他又认为，“非模仿”是正常的情况，他告诫中国人说：“如果中国下决心承认，我们在某些方面比她强，她也会最热烈地欢迎我们的文化。不过为她自己的好处起见，我希望她承认，我们并非在一切方面都超过她。”

4. “逻辑模仿律”。这是范本成为模仿对象的内在逻辑规律。和传统越接近的发明越容易成为模仿对象，与先进技术越接近的发明越容易成为模仿对象；地位最高、距离最近的人最容易成为模仿的对象——这就是“逻辑模仿律”。

5. “超逻辑模仿律”。这是范本成为模仿对象的外在社会规律。越是满足主导文化的发明，越可能被模仿——这就是“超逻辑模仿律”。

6. “风俗”与“时尚”。风俗是强劲的大潮，时尚是流行的小溪：“如果和风俗的大潮相比，对时尚之潮的模仿仅仅是一股孱弱的小溪而已。这必然是一幅对比鲜明的图画。”（141页）“优势常常站在新颖、奇异的模式一边时，那就是时尚的时代。”（140页）“古老的模式占压倒优势的时代，是风俗的时代。”（140页）“风俗——时尚——风俗”是社会运行的一个循环圈。时尚扎根而成为风俗。“风俗向时尚过渡，然后又回归更加广泛的风俗。”（140页）“在风俗呈上升趋势的时期，人们热恋自己的国家而不是自己的时代，因为它们讴歌的对象首先是过去。相反，在时尚主导的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时代感到骄傲，而不是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142页）

7. “从内心到外表”扩散的模仿律。这是“超逻辑模仿律”之一。任何模仿行为都是先有思想上的模仿，后有物质上的模仿。换句话说，思想的传播走在表达的传播之前；目的的传播走在手段的传播之前。换言之，模仿的社会行为一定要思想先行。他从大尺度的历史现象中举出一些例子，其中之一是：“模仿在人身上的表现是从内心走向外表的……16世纪，西班牙的时装之所以进入法国那是因为在此之前，西班牙文学的杰出成就已经压在我们头上。到了17世纪，法国的优势地位得以确立。法国文学君临欧洲，随后法国艺术和时装就走遍天下。15世纪，意大利虽然被征服并遭到蹂躏，可是它却用艺术和时装侵略我们，不过打头阵的还是他们令人惊叹的诗歌。究其原因，那是由于它的诗歌挖掘和转化了罗马帝国的文明，那是因为罗马文明是更加高雅、更有威望的文明，所以意大利征服了征服者。此外，法国人的住宅、服装和家具被意大利化之前，他们的习惯早就屈从于跨越阿尔卑斯山的罗马教廷，他们的良心早就意大利化了。”（199页）随后他又举了一个习以为常的例子：“如果儿童不是从里到外地模仿成人，他们怎么能够先听懂话然后才说出来话来的呢？”（205页）

8. “从上到下”辐射的模仿，也就是“下对上”的模仿。这是“超逻辑模仿律”之二。地位低的阶层和个人总是模仿地位高的阶层和个人，这是从高位到低位辐射的模仿。这个规律一般人很容易理解，因为它最普遍。我们随意举几个例子吧。“在距离相等的情况下，模仿总是从高到低、从高位人到低位人。”（232页）“巴黎是法国的喜马拉雅山；毫无疑问，它凌驾于外省的气势很有一种帝王的霸气，很有一

丝东方的迷人色彩，比昔日宫廷凌驾于它头上的气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它韵味无穷、使人欲罢不能的魅力刹那之间就可以传遍辽阔的国土，它的影响如此深刻、完全而持久，谁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乡下农夫佩服和钦佩的那种贵族。他们与城市劳工的关系就像劳工与雇主的关系。这就是乡下人往城里移民的原因。”（226页）“一个首都、一个现代大都会是所有人的第一选择，是所谓精华……城市把四面八方头脑最活跃的人、最不安分的人、最适合利用现代发明的人吸引到自己的麾下。这就是城市组建自己现代贵族的方式，这是百里挑一、不能世袭的贵族，实际上是像士兵一样应召组成的群体。”（227～228页）

9. “从下到上”辐射的模仿律，也就是“上对下”的模仿。这是社会上层对下层社会模仿的规律。这和笔者曾经提出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在1997年《东方》杂志的创刊号上撰文《水向高处流》探讨的，也就是这个规律，这就是低文化对高文化的影响。我举了一些汉族向少数民族学习的例子。塔尔德举的日常例子有：“即使在口音上，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城里人对乡下人、白种殖民者对黑人土著、成人对儿童、上层人对下层人的影响；因此在书写、手势、表情、衣饰和风俗上，高位人对低位人的影响就更加强大了，更不容置疑了。”（217～218页）他举了历史上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的例子，从他们关系来看“上对下”的模仿：“有时甚至经常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征服者模仿被征服者，借用其习惯、法律和语言。法兰克人征服高卢后被拉丁化了，他们不得不改用罗曼语。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征服俄罗斯的瓦兰吉人等都遭遇到同样的下场。”（221～222页注释）

10. “模仿的双向流动”。这是一般人最容易理解的规律，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互动的，互相影响的，所以只需要举几个例子。“互相模仿是人的普遍天性。”（242页）“事事处处都被人模仿的个人已经不复存在。在诸多方面受到别人模仿的人，在某些方面也要模仿那些模仿他的人。由此可见，在普及的过程中，模仿变成了相互的模仿，形成了特化的倾向。”（232～233页）“现代大都会的特征是内部事物大量地互相模仿；这个互相模仿的强度与人口的密度成正比，和居民的多样性、多重性成正比。”（239页）

五、欧洲汉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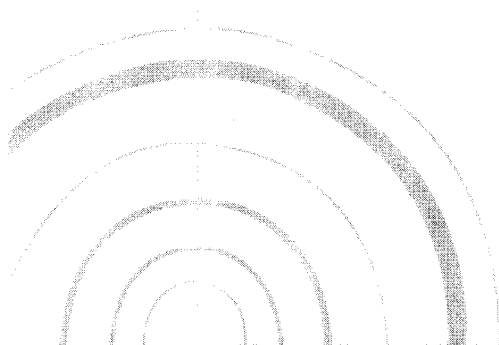
从启蒙时代到 19 世纪，欧洲吹拂着一股强劲的“汉风”，这是钦佩、学习中华文明的思想潮流。启蒙时代的思想巨人及稍后的许多思想家，都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甚至把中国思想作为自己的强大思想武器。到了 19 世纪末，虽然这股汉风已成强弩之末，但是它对一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他们能够接受并宣扬双向互动、文化多元的思想。塔尔德的著作中就有不少仰视中国文化的言论。我们略举一二，以飨读者。

“每一种古老的文明比如埃及、中国和罗马帝国，都曾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气势恢弘，然而在后辈对长辈孝敬的刺激之下，它们都开始退守内敛；在享受一套思想和制度的好处而完成一些变化之后，它们长期将自己闭锁在这一套思想和体制之中。我经常以中国为例来说明问题。”（308 页）

“文明到达顶点之后，终将走向内敛，这一天终将到来；在历史长河里，它已经无数次走向内敛的道路：在埃及、中国、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历史已经说明了未来的走向。到了高峰之后，道德在许多方面又将显示其庄严与逻辑。良心上的是非判断将要在更加理性的环境中再次兴起。”（360 页）这不是古老文明的凤凰涅槃吗？

何道宽

2006 年 1 月 30 日



英文版序

iii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是法兰西公学院现代哲学教授，兼任法兰西研究院研究员。我们奉献给读者的《模仿律》是他最有趣、最重要的著作。他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家。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实实在在的人物，思想兴趣广泛，文笔极富魅力。自从他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为《哲学评论》(*Revue philosophique*) 撰稿以来，他在同胞和国外读者中的影响与日俱增。美国学者早已熟知他意义隽永的著作。他们觉得，应该让英语世界的读者更容易读到他的著作。迄今为止，只有一本小书《社会律》(*Les Lois sociales*) 翻译成了英语，可是这本书仅仅是他哲学思想的大致轮廓而已。

塔尔德先生 1843 年出生于多尔多涅省的萨拉市。中学毕业之后，他没有到波尔多、蒙波利埃或巴黎去上大学，而是在家乡学习法学，并成为预审法官。他担任预审法官将近 18 年，这是他敏锐观察的 18 年，也是寂寞独处的 18 年，修身养性深刻思索的 18 年。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人、对社会、对世界的独到思想渐次展开，很